



国学研究丛书

华中国学

张寅公题



主编 ◎ 罗家祥

2016年·秋之卷 (总第七卷)

七言之酒，在心无往，在机
在，喜止在至善。知止而隆尊空
；空而後能静；靜而後能安；安
而後能惠；惠而後能得。物得本
支，不為矜奴。知而无往，則直
道矣。古之圣贤的位在于下者，
先治其國，然後治國者，先焉而
安之，豈高至安者。先焉而治，豈
勝焉而安。先焉而以之，豈焉而
以者，先焉而治，豈焉而治者，先
焉而治；豈知在於物。物於而後
知焉；知焉而後而然；然而而後
以焉；以焉而後而然；而後而後
安焉；安焉而後國治；國治而後
天下平。由无子臣王於庶人，壹
是皆臣歸身而為本。王本亂而文昭
者厚矣。至而厚者薄，而薄者薄
者厚，未之易也！

II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国学研究丛书

华中国学

张寅公题



主编 ◎ 罗家祥

2016年·秋之卷 (总第七卷)



者，先正至心；雖曰
藏者，先正至意；雖曰
藏者，先正至志；雖曰
藏者，先正至德；雖曰
藏者，先正至誠；高城而
知至而後立城；高城而
以正而後守備；与陽而
不离而後固圉；國固而
自是子臣至於庶人，
身為本至本風。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国学. 2016 年·秋之卷: 总第七卷/罗家祥主编.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5

(国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80-2797-7

I . ①华… II . ①罗… III . ①国学-文集 IV . ①Z126. 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5982 号

华中国学 2016 年·秋之卷(总第七卷)

罗家祥 主编

Huazhong Guoxue 2016 Nian · Qiu Zhi Juan

策划编辑：周晓方 钱 坤

责任编辑：李 祥

封面设计：原色设计

责任校对：李 琴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5 插页：2

字 数：558 千字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学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邢福义 朱雷 刘献君 杨叔子 张岂之
张勇传 韩忠学 宗福邦 葛剑雄



罗家祥



程邦雄 雷家宏 李耀南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鹏 邓小南 华学诚 刘真伦 李传印 杨果
吴根友 冻国栋 张三夕 赵国华 郭齐勇 黄朴民
黄树先 阎步克 董恩林



夏增民



总序

General preface

近 30 年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巨大进步，飞速发展的国力提升，迎来了史诗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大复兴与飞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神州大地蔚为大观的“国学热”，正是在这一宏伟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热烈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独特价值。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风雨坎坷，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从未中断，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和智慧源泉，这不能不说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之所以如此，传统中华文化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中华文化又具有哪些独特价值？以中华原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论语》为例，虽然它们具有的价值取向似乎有所不同，即所谓出世与入世，但却有着共同内核，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这一理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而当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老子》和《论语》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宝库。中华文化向来注重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强调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自然一体；讲究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遵循“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规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怀忧患意识以及“不争”与“无为”，“不争”即“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不争”，“无为”即“无所不为”的“无为”，这些文化特质所表现出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都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生物得到稳定的延续靠的是基因的遗传，又靠基因的变异得到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基因”则是文化。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过去留下的东西就是文化，这里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无形的，人类社会就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得以延续，又靠文化的创新才得以进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华文化所凝现的民族精神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如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雄姿迈入21世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显得尤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因为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取决于遗传的自然基因，而是取决于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身份。如果一个民族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丢失了自己的传统，那将只是一个种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没有民族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就会空虚和异化，则会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因此，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绝没有社会进步，但只有科学技术进步，那这个社会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很落后，这个社会也是很野蛮落后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技术很进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后，这个社会将是灾难性的。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人文文化是第一生产力的动力源、方向盘。中华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实现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文与传统，其意义不言而喻。

人们可能要问，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兼容？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仅不会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可发挥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维新后，有一位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王，他80多岁退下来之后，在日本财团开办的讲习班上专门讲他如何用《论语》来办企业，堪称毕生将中华文化、《论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原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巨大作用的经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孙、日本著名的投资者涩泽健还在强调他的哲学名言：“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利与义多么紧密的结合。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说明，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历史文化，又坚持三个面向。

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要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要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拥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国民素质就是最基本的前提。在这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认为，人文对科学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为科学发展指引方向。科学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方向完全正确。无数的事例证明，20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严重负面影响。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人文的提升当然也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其次，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动力。事实证明，只有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结出符合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20世纪享誉中外的我国老一辈科学巨子如华罗庚、苏步

青、茅以升、李国平等以及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等在国学方面均有极高的素养，这不仅深刻影响着其人格风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则将其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归因于国学大师胡适。第三，人文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科学讲逻辑，讲分析、解决问题，但科学中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需要直觉和灵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直觉、灵感、想象力从哪里来？科学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则来自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养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级的灵性，科学创造是离不开人的人文素养的。因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看，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建设当代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已刻不容缓。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近 20 年来在不同场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对创新的重要性，如在 2006 年 1 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谈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时，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到中华文化含有丰富的创新内容，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06 年 11 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每一次飞跃、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烙印。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华文化对增强民族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纵深发展，社会上许多十分严重的隐忧与显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显得极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华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养分则是亟待继承、弘扬的。举例来说，我国几千年来强调信守仁、义、礼、智、信，显然是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予以继承和弘扬的。所谓“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当前的诚信建设与道德建设显然特别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何况，通过弘扬优秀中华文化，陶冶国民感情，启迪国民智慧，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其意义非同一般。

以上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与感受。当然，挖掘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使之产生积极影响，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与共同努力，需要大批专业工作者扎实的辛勤耕耘。同 20 世纪初比，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且还应包含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也需要本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远的抱负，肩负起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责任和使命，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

近 10 年来，我校国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

一道亮丽的学术景观；2009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学科的发展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值此凝聚着大家心血的《华中国学》问世之际，谨致衷心的祝贺，更寄以深厚的期望！

最后应声明一点，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介入了国学研究之内，然而毕竟大非内行，所讲的不对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本领域专家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杨昌平

二〇一二年九月一日



前言
Preface

华中科技大学于 2008 年正式发文成立国学研究院后，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编辑出版国学辑刊，使之成为反映国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最初的想法是分门别类，逐年一辑。于是，2008 年岁尾，国学研究院即组建国学辑刊编辑委员会，出版过一部主要反映我校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国历史文化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辑刊第一辑”，由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过多次商议，编委会调整了原有思路，遂将辑刊改名为“华中国学”，自 2015 年起，每年春秋各出一卷，为半年刊，篇幅在 20 万字左右；在内容方面，除我校同仁的论文之外，也适当吸纳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收录在这本集子的论文，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诸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有的则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这些作品能得到学界各位师友、各位同仁的关注、批评与指正，将不胜欣慰与荣幸！

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到《华中国学》的编辑出版，我们要深深感谢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界前辈、学校领导和学校有关部门对人文学科的关心、爱护、支持与扶持。我校国学研究院成立庆典举行于 2009 年 4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为参加这一活动，退掉原先订好的返程机票，重新订票，赶回学校时已是凌晨，并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做了主题讲话；校党委书记路钢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致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 11 日要赴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遴选，于 10 日专门打电话到我家中对国学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他不能与会表示歉意；原校党委副书记、对我校文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刘献君教授更是全程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教

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朱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家萧汉明教授，武汉大学语言学家宗福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历史学家熊铁基教授等近70名著名专家学者或发来贺信，或莅临大会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电能源学家张勇传先生则欣然为国学研究院题写了院名。没有他们各种形式的关心与支持，我校人文学科是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一局面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学界前辈，一位深具战略眼光和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家，一位一辈子并不以人文学科为工作对象但又时时刻刻对人文学科念兹在兹、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学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杨先生毕生耕耘于机械工程领域，在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研究中，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居功甚伟，1991年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对人文学科、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倾注了满腔的热忱，真正是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予以关心和支持。除前述参加国学院成立大会的感人事迹外，杨先生为本辑刊的出版所展现的人格风范、人文情怀与高尚情操更使我们增添了难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这篇3500字的“总序”是杨先生在抱病卧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完成的，其间数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文字。须知，先生已是81岁的老人，且此类不情之请不仅不是他应做的工作，也为撰写“总序”时的健康状态所不容许，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先生独特的人格风范、宽广无私的胸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古道热肠实在是摄人心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华中国学》得以顺利出版，还得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先生，以及策划编辑周晓方女士和钱坤先生，没有他（她）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热爱以及注重发展本校人文学科的情怀，这套辑刊纳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如期问世，是不可能的。此外，辑刊的执行主编、历史研究所夏增民博士在论文整理归类、规范体例、编辑文本以及联系出版事宜等诸多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修订



目
录
Contents

【总论】

- 天人之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李耀南 (1)

【文献学研究】

- “自古兵家流，皆出司马法”——《司马法》之综合研究 黄朴民 (11)
石刻文献题署风气的起源及定型 孟国栋 (31)
读阜阳汉简《万物》缀合三题 刘金华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订误 李裕民 (47)
明末李腾芳《宦寺考》编刊时间考 吴兆丰 (77)

【古代史研究】

- 浅析诸葛亮治国实践对后世的影响 白杨 (85)
宋朝武举制度概况研究 张希清 (95)
苏东坡游历阳新、庐山考
——以《兴国州志》所载为例 董恩林 (129)
元统御试策问与对策研究 邱居里 (137)
期为豪杰：元儒吴澄的学术面向与道学承创 朱冶 (155)
明代经筵讲官与皇帝的特殊师生关系考论 谢盛 谢贵安 (163)

【近代史研究】

- 从纸币帝国到白银帝国
——近代中国衰落的货币制度成因 张光 汤金旭 (187)

立身则志在儒行，论政则期于民主

——记曾被遗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张君劢 张超 (205)

【汉语史研究】

黄仁瑄点校之《大唐众经音义》序 厉迟治平 (213)

先秦至西汉的非介词结构性前置方式状语 何洪峰 (235)

【访谈】

实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完美结合，培养一流人才

——专访华中科技大学国学院罗家祥院长 罗家祥 (247)

【札记·书评】

国学刍议 王武子 (255)

读书五题 成松柳 (259)

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读后 高士捷 (273)

“五马”南渡时间小考 陶正桐 (279)



天人之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华中科技大学 李耀南

天人之学认为天地是人的本原，人与万物具有平等的存在意义，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构成相为相济的整体。人既利用万物又当保持自我节制，万物于人不只有实用价值，更有审美与道德上的意义。顺应自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则，主张在理解和尊重物之自然性的前提下，人力的施为与物的存在特性和发展方向保持内在一致，顺物之自然性而为且不突破物所能忍受的限度，人力顺应自然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放纵人欲会过度耗损自然资源，败坏人的德性，伤害人的生命，造成社会纷争。

凡此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在于，人当尊重、敬畏自然，扬弃与万物单纯的实用关系，恢复与物的全面、丰富的关系，顺应自然而为，而节制物欲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生态”作为自然存在物，体现为生物的生存状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文明”是人的历史性创造成果，“生态”与“文明”的关系归结为历史中不断演进的自然与人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修正、调整乃至根本改变人对自然的观念、态度与行为，构建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理论和成功经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之学更能为之提供深刻的理论借鉴。

一

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构建需要回到本原层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前提。传统天人之学对此的论述大体可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天地之于人的关系。《周易》提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①“天地”包含今天自然界的含义，天地先于万物而存在，没有天地就没有万物和人类的产生。《尚书》：“惟天地万物父母”，^②《庄子》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③古人认为，天生物，地养物，天地对于万物有如父母一样。天地能孕育人类万物，这是天地崇高的生生之德的表征。因而《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也。”^④本是本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万物和人的生命根源于天地。董仲舒认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⑤董仲舒上承周人对于天的崇拜，周人的天固然是神明的天，但是“天的本义中，自然义甚为隆重”，^⑥因而董仲舒的天作为神性之天，也向下涵括自然之天，天创造了人，是人的生命的大本大宗。

其次是人之于天地的关系。《礼记》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⑦所谓“天地之德”，是说“天以覆为德，地以载为德”，^⑧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故从根本而论，人是天地之德性两相和合的产物，是阴阳二气凝聚而成，是形魄和精神的妙合，人萃聚了五行最为灵秀之气。《内经》：“人生于地，悬命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⑨这里的“命”当指人的寿限之修短，人成形于地，寿限秉自天。天人之学此类论述甚多，其要义在于：天地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仅仅可供利用的对象，而是与人类具有母子一样的血脉关联。因为天地创生了人类，没有天地就没有人类，所以古人认为天地于人有巨恩，人对天地要有敬畏之心，遂有“敬人畏天”之说。^⑩天地具有不可测度的神秘性，因此，古代天子诸侯有祭祀天地的传统。《国语》：“天子遍祀群神品物，

① 《周易·序卦》，王弼注，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② 《尚书·泰誓》，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1页。

③ 《庄子·达生》，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31页。

④ 《荀子·礼论》，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49页。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8页。

⑥ 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07页。

⑦ 《礼记·礼运》，郑玄注，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17页。

⑧ 《礼记·礼运》，《礼记正义》，第917页。

⑨ 《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⑩ 《逸周书·成开解》，黄怀信、张懋铭、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9页。

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①天子要普遍祭祀万物诸神，诸侯要祭祀天地、日月星辰以及封国境内的山川，表达人对天地神祇、日月星辰和山川之神的沟通与仰戴，目的在于“报本反始”，^②就是对人与万物之本源的一种致敬、报答。这种祭祀具有浓厚的宗教政治意涵，同时也表达了古人对于自然意义上的天地山川的依赖、感恩和敬畏之情。

随着近现代社会巨变，传统天人理论架构完全解体，尤其是在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传统理论多被大众忽略乃至忘却。建设生态文明不能只是停留于一些具体的措施步骤，以及技术层面的操作方案，而是应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自然的观念和态度，回到本原的层次进行深度的理论反思。只有深刻领悟自然之于人类的本原关系，才能修正人对自然所持的单纯的实用、功利立场，寻回我们史上曾经有过但尔后失落已久的对于自然的依赖、感戴和敬畏之情。今天对于自然的依赖、感戴和敬畏并非回到图腾崇拜时期，让人匍匐于自然的威力之下，也不可能采取古人祭天祀地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它是让人有一种深刻的理性自觉，自觉到人在自然面前永远的有限性，自然在终极意义上有着我们所不可知晓的奥秘。人在自然的终极奥秘面前应当始终保持戒惧和敬畏。这样说并非倡导不可知论或者神秘主义，而是站在更高层次对于自然的一种洞见，是人的理性为自己设置边界。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自然面前持守谦恭，对于自然的行为才会谨慎一些，生态文明建设才有根本的理论支撑和引领。

二

建设生态文明应该重新谛视人与万物的关系。天人之学对此有丰富的阐述。其一，人与万物平等且一体共在。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③气是构成万物的质素与动力，人与万物都是一气所化生。所谓“假于异物，托于同体”^④，人之生是气的凝聚，这个气此前曾经构成其他的不同事物；人之死是气的消散，这个气又会形成其他的事物。人和万物各有其特性和存在方式，气作为构成人与万物的共同基质与生命动力，使得人与万物没有绝对界限，人中有物，物中有人。人往往从自身需要和价值立场出发，把物区分为有用无用、高低优劣等诸多层级，并且以为人高于万物。庄子认为，立足于道的立场来看，万物并没有人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⑤人不过是天地万物中之一物而已，从存在的层次上看，人并不优于万物，而是与万物平等，一体共在。人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万物各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万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既不逊于人，也不取决于人的评判赋予。“毛嫱丽姬，人之所美，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⑥人以毛嫱丽姬为美，这只是人的审美评价，这种评价不会得到人以外的其他物种的普遍认同，因此人应等视人自身与万物的存在。韦政通认为，庄子齐物思想“含有一种普遍尊重生命的伟大伦理精神”。^⑦尊重万物的生

① 《国语·楚语下》，徐元诰撰，王树明、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8页。

② 《礼记·郊特性》，《礼记正义》，第1070页。

③ 《庄子·知北游》，《庄子集释》，第730页。

④ 《庄子·大宗师》，《庄子集释》，第273页。

⑤ 《庄子·秋水》，《庄子集释》，第563页。

⑥ 《庄子·齐物论》，《庄子集释》，第98—99页。

⑦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28页。

命存在，就不当因人的存在而轻视万物的存在。“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①就功能而言，人有人的才智能力，万物也都各有其能，各有其用。同时，作为有限的存在，人和万物都有各自所不具备的功能，人缺少物所具备的功能，物也不具备人的能力。我们不可因人的才智秀出万物便漠视乃至否定万物各自之功用。更重要的是，物的功用也许和人相关，也许和人没有直接关系，万物各自的功用在天地整体的格局里都是不可缺少或替代的。万物的意义不能总是从人的角度来衡量，万物首先作为其自身而存在就是万物最根本的意义。郭象提出：“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②人与万物两相对待，互为彼此，人作为人而存在，任何一物都作为其自身而存在，物不是为了人的存在而存在，人也不是为了物的存在而存在，然而人与物各自的存在又成就了彼此的相为相济之功。这样每一物与他物的存在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的存在成就了物的存在，物的存在也成就了人的存在。物与物以及人与物构成了一种“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的唇齿相依的存在整体^③，这个整体中的任何一物对于他物和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其二，“利用厚生”^④与“以时禁发”^⑤。“利用厚生”就是尽物之用以有益于民生。正因为人的存在必须利用物，物之于民生不可或缺，所以天人之学主张人对物的利用应有节制。古代中国是农业耕种的国度，古人很早就提出“土劝不极美，美不害用”^⑥的思想。耕种土地可以收获人所需要的作物，但是不要过度耗损乃至穷竭地力，穷竭地力就会影响以后的耕种；不穷竭地力，土地就能持续提供物产供人受用。所以人要爱惜地力，节制人对地力的无尽掠夺。与之相关，就有“以时禁发”^⑦的思想来协调人的需要与物的存在。“以时禁发”约称为“时禁”，“时”指天地四时寒暑的变化，以及发生于其中的“风雨雷电等直接关系农事活动的自然现象”。“时”与“人类的政治、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⑧同样密切相关。“天有四时，不时曰凶”，^⑨人的作为要顺应四时节令变化，应时而动，适时而止，违背时令，妄作妄为，就会有凶厄发生。“以时禁发”就是对山林薮泽的采伐和对禽兽的猎捕在特定时令开放，其他时段封禁，目的在于既考虑人对于物的各种需要，又关切物的存在繁育。“以时禁发”凝聚了古人既利用物又对物保持自我节制的深刻智慧。有论者认为，“时禁”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氏族时代，^⑩《尚书》记载帝舜以伯益为“虞”，^⑪“虞”是掌管山泽所生之物及有关采伐捕猎之禁令的职官。虞官的设立表明“以时禁发”成为国家的政令制度。《逸周书》云：“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

① 《庄子·秋水》，《庄子集释》，第576页。

② 郭象：《庄子注·秋水》，《庄子集释》，第557页。

③ 《庄子·大宗师》，《庄子集释》，第269页。

④ 《左传·文公七年》，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2页。

⑤ 《荀子·王制》，《荀子集解》，第168页。

⑥ 《逸周书·程典解》，《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79页。

⑦ 《荀子·王制篇》，《荀子集解》，第160页。

⑧ 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⑨ 《逸周书·武顺解》，《逸周书汇校集注》，第310页。

⑩ 刘怀君、李恩军：《“以时禁发”话虞官》，《环境教育》2004年第5期。

⑪ 《尚书·舜典》，《尚书正义》，第103页。

夫然，则有生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①根据周公的讲述，在夏禹之时就有明确的“时禁”思想，禁止春天进入山林砍伐。春气为生，春天伐木杀物会戕害自然的生气。这个禁令的实质就是“无伐不成材”，^②让林木适时生长。夏天是鱼类繁殖的季节，禁止去江湖中下网罟，以成就鱼类的繁殖生长。这样既让自然物产能持续供给人们的需要，也让万物生息繁衍；既是尽人性，也是尽物性。我们看到“以时禁发”实际上是在国家法律和制度层面来处理人与万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国家治理。“时禁”思想甚至与人的孝、恕、仁、天道等重要观念结合起来，^③天人之学主张对于自然万物也要持有类似于人的道德伦理观念，或者说，人的道德伦理观念也适用于自然万物，对待万物如同对待人自身那样。商汤的“网开三面”被诸侯称为仁德施及禽兽，^④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⑤也是对万物有仁心的具体表现。孟子提出君子要“爱物”，^⑥惠子主张“泛爱万物”。^⑦董仲舒提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⑧仁爱不只限于人的范围，而是推及于鸟兽昆虫，仅仅爱人而不爱鸟兽昆虫，不能算是真正的仁爱。王守仁本着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把对人的爱推及天地万物，人不仅见到“孺子之入井”会产生恻隐之心，即使听到动物的哀嚎，看到草木的摧折，乃至无生命的瓦石的毁坏等等，也会同情地体会到万物的“痛楚”，产生顾惜恤之心。^⑨这是一种极为博大仁厚的生态伦理情怀，值得我们深思汲取。

其三，天人之学更重视天地万物与人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道德与审美两个方面。《周易》的“天行健”^⑩是说天运行不辍，具有刚健强劲之德；“地势坤”^⑪是说地容载万物，具有广厚之德。天地创生万物体现了天地的至善之德。“继之者善也”，^⑫传继天地之道的就是善。天地不仅是生命的来源，也是人的德性的根源，人的德性系秉承天地的德性而来。老子有所谓“上善若水”，^⑬上善就是最高的善，老子以水拟况上善之德，万物得水则生，失水则死，水利万物而不争，且甘处卑下之地。具有上善之德的君王也应该如同水一样，能够守柔、处下、不争，如此方能为万民所归往。《说苑》载录孔子“水者君子比德”^⑭的言论，从水的多种特性领悟人的仁、义、智、勇、贞等多种德性。在儒道二家的天人之学看来，物也有其德性，物的自然性似乎本身就是某种德性的显现，由

① 《逸周书·大聚解》，《逸周书汇校集注》，第 406 页。

② 《逸周书·文传解》，《逸周书汇校集注》，第 207 页。

③ 王文东：《论〈礼记〉的生态伦理思想》，《古今农业》2006 年第 3 期。

④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95 页。

⑤ 《论语·述而》，黄怀信主撰，周海生、孔德立参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633 页。

⑥ 《孟子·尽心上》，赵岐注，孙奭疏，廖明春、刘佑平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77 页。

⑦ 《庄子·天下》，《庄子集释》，第 1095 页。

⑧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春秋繁露义证》，第 251 页。

⑨ 参王守仁：《大学问》，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968 页。

⑩ 《周易·乾》，《周易正义》，第 10 页。

⑪ 《周易·坤》，《周易正义》，第 27 页。

⑫ 《周易·系词上》，《周易正义》，第 269 页。

⑬ 《老子·八章》，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78 页。

⑭ 《说苑·杂言》，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434 页。